

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构成、路径与管理机制

崔艳天

【摘要】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是一个以节点、通道和整体环境为核心的线形遗产区域,具有空间构成要素复杂性与多时空动态发展的特征。遗产、绿色廊道、游步道和解说系统等构成要素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以节点、通道和辐射域面的形式构成共同进化、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要发挥节点的核心驱动作用、注重轴线的串联带动作用、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功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保护、旅游休憩和地方经济的整体性发展等多重目标。为协调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之间更高层次、更深度的合作关系,提出设立廊道管理机构,建立廊道运行管理机制,构建廊道区域分工机制,探索廊道共建共享机制。

【关键词】遗产廊道;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发展;协同机制

【作者简介】崔艳天,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世茂都,E-mail:yanyangtianzi@163.com(710018)。

【原文出处】《文化产业导刊》(京),2022.1.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21ZD03)”、陕西省社科基金“陕西省数字文化产业创新路径与协同机制研究(2021J025)”、陕西省教育厅招标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陕西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20JY004)、中央高校基金项目“数字文旅产业体系构建与创新路径研究(300102112609)”。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建设黄河文化遗产廊道。黄河是一条承载中华文明基因、传播民族力量的大动脉,由于时空跨度大、结构复杂,碎片化、静态化保护现象较为突出,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不足。建设黄河文化遗产廊道,通过串珠成线、以线带面的方式将黄河沿线的历史、风俗、故事、艺术、文物、建筑等文化要素和生态要素进行串联整合。突破以往关注于局部要素的静态视角,着眼于多维度的价值和功能,以动态的视角来推动遗产廊道的自然功能、历史功能向现实功能演进,在更高层次上协调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经济振兴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对推动沿黄九省(区)经济文化生态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概念源流及特征

(一) 遗产廊道概念及判别标准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20世纪80年代

在绿线公园、国家保护区、绿色廊道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是美国的一种跨区域遗产保护理论与规划方法。遗产廊道作为遗产区域的早期形态,属于国家公园管理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复杂化以及景观保护体制创新的要求,“绿线公园”和“国家保护区”在强调多方合作的基础上,主张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历史保护紧密结合。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文化和历史保护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国家公园的内容。“国家遗产廊道”作为“新型国家公园”,其整体性思维就来源于此。1984年,美国国会立法指定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为国家遗产廊道,标志着遗产廊道概念的确立。遗产廊道作为线性文化景观,一般依托山川水系、交通干线或文明交流路线等线性载体,将若干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遗产点串联起来,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保护、旅游休憩和地方经济的整体性发展等多重目标,在选择遗产廊道及其保护对象时,应遵循以下

几个标准(Flink C. A. & R. M. Searns, 1993):

一是遗产廊道通常跨地理区划或文化区域呈线性分布状态,既可以是特定区域的一条水系,也可以是跨区域水系或铁路、道路等交通通道,将沿线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元素有机地串联;二是历史及建筑的重要性,廊道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建筑、工程等要素,拥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筑或工程具有形式、审美、结构、演化上的独特性;三是强调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双重依赖,自然地理是多样化人类活动展开的基础,生态环境同样因文化遗产的地位和获得更多的关注;四是经济重要性,指保护廊道能否通过发展休憩旅游业振兴地方经济,带动就业和税收增加。^①

(二)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从遗产廊道所反映的内涵来看,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是以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作为主轴,通过集聚与黄河具有空间相关、功能相关和历史相关的自然及文化资源要素,由节点、通道和辐射区域共同组成的线性空间。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概念具有多维度的内涵和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是大尺度的动态线性文化景观。一个地区新文化现象的出现通常是将旧文化经过选择、转换和重新解释后叠加在新的文化结构当中,成了新、旧、异“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状态。^②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是在多时空的文化背景和空间基础上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反映了交互式的、动态的以及演变的人类文化间联系的过程。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分别孕育了人类四大文明,唯有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黄河文化不断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对各种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升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因此要从发生学视角动态的看待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构成、价值及功用。

第二,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具有空间构成要素复杂性的特征。黄河文化遗产廊道依托于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以“历史关系”和“文化景观”为纽带,串联城镇、文化景观和单体遗产,通过空间相关、功能相关和历史相关的构建原理实现人、地、物、故事

复合,是道路及其辐射范围内的物质空间与以廊道文化为主题的文化空间的耦合。^③不同历史时期在遗产廊道的各个节点汇聚了习俗、信仰、建筑、服饰、语言、节事等文化内容,反映了文化基因、文化类型、文化表象之间的叠加关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多维度的文化活动与交流,强调文化遗产背景环境和相关区域的整体价值,揭示了黄河文化遗产廊道不同的历史剖面,具有空间构成复杂性等特征。

第三,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是一条具有多维度价值和功能的跨越时空通道。从纵向时间经度来看,黄河文化的萌芽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旧石器时代的蓝田文化、丁村文化、大荔文化,到新时期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黄河文化不断吸纳其他文化因子,迅速集聚成长,形成早期中国雏形。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夏、商、周三代的王国时期,以及帝国时期的秦、西汉、东汉、隋、唐、北宋等几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其核心地区也都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开创了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文明体系。及至清代,随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最后形成与确定,黄河文化与中国境内诸多文化融为一体,共同铸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体系。^④由于地理基础的影响和历史文化的变迁,黄河的价值和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动态演变中,具有跨时空的复合性等特征。

二、节点、通道、域面: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系统构成

朱强等(2007)认为,遗产、绿色廊道、游步道和解说系统是遗产廊道的四大构成要素,^⑤这从建构路径的维度确立了遗产廊道的空间构成框架,但没有从系统角度厘清要素间的内在组织关系。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在遗产廊道这个巨系统当中,不同的子系统之间通过能量转化和互相作用,形成了系统发展变化的机制。遗产、绿色廊道、游步道和解说系统等构成要素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以节点、通道和辐射域面的形式构成共同进化、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

(一)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节点及空间层次

节点是遗产廊道最基本的空间要素之一,影响

着遗产廊道的基本走向和通达性。^⑥节点按照不同的等级可分为城镇、文化旅游集聚区和遗产三个层次。

1. 城镇是遗产廊道的起始节点

城镇作为黄河流域人地巨系统中的关键节点,^⑦是遗产廊道的起始点,其形成先于廊道,是由经济活动的内聚力极化形成的中心,并向周边区域辐射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位于黄河流域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16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9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91处,中国传统村落678处。^⑧西宁、银川、呼和浩特、兰州、太原、西安、郑州、济南等区域中心城市和分布于黄河流域的节点城市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黄河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形、数、理、气、象统一的形式集中体现着黄河文化的精髓。同时作为区域经济和文化旅游发展的集聚地和支撑点,其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代表性,且对区域经济社会进步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决定了他们在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战略地位和分工各不相同。科学确定不同层级城镇对黄河文化遗产廊道“以点带面、串珠成线”的空间开发策略至关重要。

2. 文化旅游集聚区是遗产廊道的中观节点

文旅小镇、文旅产业园区、文旅综合体、文化旅游景区或文化旅游度假区等形态的集聚区是黄河文化遗产廊道中观层面的节点,具备显著的文化传输功能和产业经济功能,对于促进黄河文化资源的集聚和扩散,推动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分工协作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显著作用。截止到2019年,黄河流域共有4A景区449个,5A旅游景区39个。^⑨台儿庄古城文化产业园、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成都青羊绿舟文化产业园、西安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园、敦煌文化产业园等国家级文化产业园,由某些实力突出的创意企业在特定区域集聚,形成了一些资本、创意和技术要素高度集中并具备空间生产、休闲消费、公共服务等多种功能,通过关联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促进自身并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增长。建设黄河文化遗产廊道要以文化旅游集聚区为载体形成多种主题互为补充的特色空间,通过空间生产与消费推动资源的集聚与扩散,实现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的集聚整合和互补协调发展:

3. 遗产是遗产廊道最基本的单元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复杂的时空结构和自然、人文环境决定了流域内分布着众多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黄河流域有世界自然遗产2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1处,世界文化遗产共有11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3处,全球农业文化遗产3处,国家自然保护区53处、国家风景名胜区26处、国家森林公园95处、国家地质公园39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87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748项。^⑩自然地理是人类历史展开的基础,黄河流域丰富的地理风貌和实践活动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高密度、高品位的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为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真实性提供了实体证明,见证了民族间交流和对话过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给予构成整体的各元素赋予独特的价值。以活态遗产形式存在的自然遗产不仅具有保护生态多样性、经济发展等复合功能,也为黄河文化的充实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养分。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蕴含着“文化和文明的最高原因”,其内在的信仰习俗、特定的生活方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稳固的价值观,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价值观、风俗民情、精神风貌的塑造和养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了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基本底色。^⑪

黄河文化遗产廊道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手法将多样的自然和遗产资源联接起来形成独特的整体,不同地段丰富多样的景观也塑造了遗产廊道整体的多样性特色。务必要把握“自然与文化高度融合统一”这一基础特征,将遗产资源置于真实的空间和历史范畴中,通过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将黄河流域内文化遗产串联起来,进一步推进流域生态资源、文化要素的协调保护和发展。^⑫

(二) 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通道及空间走向

通道作为连接节点的交通线路,包括绿色廊道、游道和交通干线,具有人员来往、信息交流、货物运输的渠道作用。^⑬绿色廊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自然保护区和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强调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功能。连续的绿色廊道有利于物种的空间流动和本来是孤立的斑块内物种的生存

和延续。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汇集了白河、黑河、湟水、祖厉河、清水河、大黑河、窟野河、无定河、汾河、渭河、洛河、沁河、大汶河等40多条主要支流,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四个地貌单元,在保持生物多样性及廊道连通性最关键的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青藏高原绿色廊道、青甘河谷绿色廊道、宁蒙河套绿色廊道、晋陕峡谷绿色廊道和豫鲁平原绿色廊道五条关键廊道。这五条连续的绿色廊道将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附件的湖泊、小的支流和大面积的湿地连接成连续的带状廊道,有助于为分散于廊道周边的文化遗产形成统一连续的基底背景。

游道是遗产廊道发挥旅游功能的重要交通路线,可用于步行、跑步、骑行、划船、观光等一系列旅游娱乐活动。游道的设计是综合考虑人地关系系统的重要环节,既要在不破坏生态景观的前提下让游客领略自然之美,也要在尊重原有历史路径的前提下,通过解说系统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黄河上游地区交通运输主要是向东、向东南方向。陇海线是黄河下游通往上游最主要的交通主干线,并通过兰新线成为亚欧大陆桥。其次是沿黄河的包兰线和太中银铁路。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八纵”中涉及黄河流域的是呼南高铁、包(银)海高铁、兰(西)广高铁,“八横”中涉及黄河流域的是路桥高铁、京兰高铁、青银高铁。^⑭目前发展最快的是航空运输,最主要的货运方式是公路运输,不同城镇、湖泊、支流之间的连接性和通达性还需提高,以便于人们通达、体验、了解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内涵。

(三)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辐射域面及空间范围

辐射域面是指节点和廊道影响力所波及的范围,即“点—辐”和“轴—辐”交互影响的空间组织模式。辐射域面的大小因节点和廊道的功能强弱呈动态变化。^⑮由地形地貌、廊道、节点叠加文化要素经过转换和重新解释后形成相近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即文化地理区。在同一个文化区内,居民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是不同文化特质的空间载体,同时还随着黄河文化的发展、扩散和融合而不断动态发展。

根据黄河流经区域的文化特质,黄河文化区由河湟文化区、河套文化区、三晋文化区、关中文化区、河洛文化区和齐鲁文化区组成,由重要节点和通道组成的六大文化区构成了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辐射域面。在社会经济文化系统中,六大文化区与黄河流域分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晋中城市群七大城市群具有耦合性。城市群在更广阔空间上提升节点之间的联通性,通过区域组团式发展模式,将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和齐鲁文化融入到区域性产业、基础设施、城乡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发展进程当中,是实现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化的重要载体。

三、点线面联动: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空间构建思路

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是一个以节点、通道和整体环境为核心的线形遗产区域,根据黄河流域的空间构成要素及资源空间分布,本文从“点—线—面”三个层次提出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空间构建思路。

(一)发挥节点的核心驱动作用

依据“点—轴”理论,“点”是指各级发展中心。根据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空间构成要素,遗产、文化旅游集聚区和城镇是其三个节点层次。应当将重要遗产、文化旅游集聚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及名城名镇名村作为黄河流域经济生态文化系统中重要的“增长点”,沿廊道基础设施束渐次扩散社会经济“流”,充分发挥扩散溢出效应,形成以点带面、城乡联动的发展格局。

第一,发挥遗产的核心吸引物作用。遗产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和核心载体,已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黄河流域遗产资源密度高、品位高、价值大,但碎片化、静态化保护问题突出,保护内容割裂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亟需加强。一是系统梳理黄河的文化发展脉络和资源分布,采取“主题确定—资源调查—分析与评价—格局建构”的思路系统梳理自然、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等级、规模、组合和结构,挖掘、提炼核心资源的内涵、特征和价值,通过解说系统的组织增进大众对核心遗产历史背景与文化特征的了解。二是突

出重点打造黄河文化标识物,遴选一批资源稀缺、景观独特和不可复制的具有重要遗产,通过内涵解读、符号提炼、解构与重构、场景构建等策略打造一批代表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价值的文化标识物,充分发挥其核心吸引物作用打造世界级的黄河文化旅游目的地。三是把握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空间构成复杂性、动态性和景观多样性的特征,从时间、空间、遗产本体、生态环境等方面挖掘区域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将水系、水利工程、湿地、森林等自然遗产和历史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及礼仪、风俗、节气、服饰、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系统性、整体性、网格性的保护开发系统当中。

第二,发挥文化旅游集聚区的集聚扩散效应。文化产业园区、景区、特色文化街区等载体空间有显著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不仅是支撑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建设的重要节点和窗口,而且是黄河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标杆。但由于黄河空间跨度过大,文化旅游资源要素集聚水平不高。首先充分挖掘黄河特色文化资源,对黄河文化符号进行深度提炼、设计与活化,从创意设计、市场运作、科技提升、配套服务等方面提升传统旅游产业文化内涵,实现文化旅游融合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提升要素集聚水平。其次围绕核心景区和文化产业园区、特色街区确定业态内容、主题及布局,打造黄河文化产品体系和产业体系,实现黄河文化资源整合、市场推广、业态创新等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最后推动园区、景区场景化建设,以旅游景区和文化产业园区、特色街区等集聚区为载体,在保护整体文化风貌、留存文化标志和历史记忆的前提下,以文化科技融合、空间创意及互动业态创新为支撑,按照文态、业态、形态和生态四合一的方式,^⑩打造一批富有黄河文化特色的生产性和消费性场景,孵化一批文创企业、园区,布局创意工坊、文创集市等新业态,打造黄河文化核心展示区、黄河文化生态保护区和黄河文化旅游示范区。

第三,发挥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城镇作为遗产廊道的起点,级别、功能和作用的转化影响辐射域面的范围大小。不同级别的城市作为黄河流域经济生态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增长点”,沿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基础设施束渐次扩散社会经济“流”,充分发挥扩

散溢出效应,形成以点带面、城乡联动的发展格局。首先,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区域中心城市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资源密集,一般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旅游区。2018年沿黄九省区中心城市旅游接待人次共91685.54万,占黄河九省区比重的22.65%,占全国旅游接待人数的16.55%;旅游总收入共11522.51亿元,占黄河九省区比重的24.15%,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19.3%。九大区域中心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不论在黄河九省区还是在全国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增长极作用非常显著,因此要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纽带,有效整合黄河流域具有典型价值的资源要素,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一定空间形态和组合特征的特色区域,加强与黄河流域中小城市的文化经济交流,促进黄河流域文化产业的城市分工与协作,通过扩散机制和集聚机制实现要素的流动集聚与动态平衡。其次,以历史文化名城为引领,以重点旅游城市为核心,充分发挥世界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载体作用,依托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景区、度假区等公共空间及旅游功能区,对空间形态、总体形象、主题定位、发展重点、标志性景观等内容进行系统谋划,打造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彰显城市文化品牌。最后,以县域为载体寻求黄河流域新的发力点。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承担着培育县域经济新动能、推动城乡衔接的双重功能,要充分挖掘民间文化资源,以补短板设施建设为主导,以功能性建设为契机,打造一批黄河流域文旅功能县,通过空间上全域推进、城市功能全面转型、管理体制全方位整合,形成对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有力支撑。

(二) 注重轴线的串联带动作用

轴线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促进点与点、区与区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黄河流域跨度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较为突出,应当依托黄河干流及沿线交通要道,提升节点之间的连接性和通达性,形成串珠成廊的发展格局。

第一,完善交通设施网络构建黄河国家风景道体系。交通的通达性有助于公众深入了解廊道的文化内涵与景观魅力。黄河流域尤其黄河上游地区,城市之间、景区之间的连接性还有待提高。首先,构

建慢行游憩系统,通过遗产旅游、水体休闲、慢行休闲、野外休闲、冬季休闲等游憩系统规划的规划,开展黄河风情线公共设施、健身步道建设,动植物保护,两岸绿化、美化、亮化工程等方面工作,建立完善的标识系统和集散体系。其次,完善黄河绿道体系建设。构建连续的绿地系统有助于为沿廊道散布的文化遗产形成统一连续的基底背景,应当依托黄河沿线自然环境加强黄河文化遗产基底背景的整体性。沿黄河干流和湟水、洮河、汾河、渭河、泾河、洛河、沁河、大汶河等支流岸线,建设青藏高原绿色廊道、青甘河谷绿色廊道、宁蒙河套绿色廊道、晋陕峡谷绿色廊道和豫鲁平原绿色廊道等重点绿道,通过建立各遗产、湿地、湖泊、滩涂等节点之间的历史关联、功能关联、空间关联和视觉关联、结构关联以及心理关联,构建黄河国家风景道体系。最后,优化提升既有普速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干支线机场功能,加快形成以“一字型”、“几字型”和“十字型”为主骨架的黄河流域现代化交通网络,实现城乡区域高效连通。

第二,建设黄河复合型生态航道。由于大部分黄河河段不具备通航功能,节点之间的连接性以及旅游的回路性、连通性亟需得到提升。实质上早在2013年,国务院批复的《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中也提出:“2020年实现重点区段的分段通航,2030年实现全河适宜河段的分段通航”。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黄河干流适宜河段旅游通航和分段通航”。需要联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旅等相关行业部门,形成以水利、航运为主导的联席工作机制,集聚社会力量参与,通过航道疏浚、河势控制、碍航建筑物生态改造、码头建设等措施,分期、分段推进黄河复航和生态航道建设。秉承大生态、大保护、大治理的理念,提升黄河生态廊道与文化资源的整合程度,使历史文脉植入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工作中,实现黄河河道与滩区、大堤防护林、历史文化景观等的有效串联,建设兼具生态、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等各类功能的黄河复合型生态廊道。^⑦

第三,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实现多维度交流。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可以将一些原本在空间或

历史上关联性不强的遗产、城镇、村落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状态,实现以景点为核心的开发模式向以线路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推动不同地区之间多维度的资源、产品、知识、思想和价值之间的交流互动。应当立足全域统筹,充分对接市场需求,从满足游客实际出游需要,以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黄河文化旅游资源为节点,以中华文明探源、寻根问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古都文化、非遗、乡村振兴等为主题,通过“文化场景化、场景主题化、主题线路化”的设计,打造一批跨区域的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全面展示真实、立体、发展的黄河流域,塑造“中国黄河”整体形象,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助力黄河流域建设彰显国家形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旅游目的地。

(三)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功能

黄河流域城市群在黄河流域九省区占据重要战略地位,集中了流域60%以上的人口,经济总量占九省区的72%,是黄河流域人口密集区 and 高质量发展重心区。但在国务院批准的几大城市群规划定位中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群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只有宁夏沿黄城市群提出要建设中国面向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关中平原城市群提出要打造传承中华文化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其他五个城市群的定位都对经济发展、交通建设重视有余,对文化建设重视不足。^⑧首先,要充分重视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区域带动作用,将文化作为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将黄河沿线自然和文化遗产整体纳入到整体性、网路性的保护开发系统当中,由过去重经济、交通建设的“经济型城市群”向生态、经济、文化并举的“文化型”城市群演变。其次,要立足黄河流域城市群多元文化格局,对流域内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民族文化进行整合,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串联整个区域的生态景观、城镇、村落、遗产,变城市群的文化价值为经济社会价值。最后,构建黄河流域城市群协同机制,加强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建立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交流合作联席会议制度、黄河流域城市群文化联盟、区域性行业协会等形式,促进人才、资本、创意、技术等要素在黄河

流域流通和交换,实现由无序走向有序并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功能结构。

四、协同共建: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管理机制

针对黄河流域空间尺度大、涉及利益主体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发展问题,谋求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整体性发展,需要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更高层次、更深度的合作关系,加强地区之间的线性资源整体性保护与统筹利用,减少地区竞争对资源碎片化利用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 设立廊道管理机构

建设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协调不同行政区域和职能部门。在美国,遗产廊道隶属于国家公园体系,通常会经国会立法授权,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州/地方政府、公民个体、非营利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多方合作伙伴共同组成,例如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委员会、伊利诺伊—密西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委员会都负责为遗产廊道的建设筹集、分配资金,并具体负责廊道的保护、解释计划、教育、娱乐建设等。在我国,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建设尚停留在概念层面,建设管理主体不明确,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之间的关系也不明晰,一方面要厘清黄河文化遗产廊道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之间的关系,明确二者的边界、使命及权属关系;另一方面建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总体协调,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成立囊括黄河九省(区)政府、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个体共同组成的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委员会,在横向上协调财政、交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林业、国土、文物、文化旅游等部门,建立跨省协调机制,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统筹指导推动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建设,协调解决重大政策和重点问题。

(二) 建立廊道运行管理机制

美国运河国家遗产廊道在管理方面具有国家支持、地方主导,以非政府组织为生力军的草根性质,这种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投入遗产廊道建设。一是建立多方融资机制。美国在每条遗产廊道的授权法中都明确规定了获得专项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年限及数额,并要求地方政府予以配套,实质上来源于政府的专项资金仅占一小部分,更多的建设资金都来自于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公共土地

信托基金等非营利组织。实践证明,国家通过资金杠杆吸收民间资本的效果远超预期。可由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委员会设立遗产廊道专项资金,同时设立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发展基金,鼓励通过市场化手段筹集建设运营资金。二是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公众是深入开展黄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群众基础,尤其以活态传承为主要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与传承。因此,畅通公众参与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建设的渠道,建立以共同愿景为纽带的多元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管理。三是积极培育区域性合作组织。近年来我国在区域间合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但运行与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应该学习国外区域性合作组织的经验,通过加强区域间重大事务合作来弥补各级政府行政区划带来的裂隙,让区域间合作组织在线性遗产保护、环境规划、旅游发展等方面各尽所能。

(三) 构建廊道区域分工机制

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建设,是一个兼顾多重目标、多重约束,较为复杂的优化过程,需要建立具有较强执行力的区域分工机制对九省(区)发展目标、增长路径、利益取向进行协调,尽可能减少地区之间的同质化发展或模仿性增长。一是建立区域横向分工机制。根据黄河上中下游的资源现状与经济基础,明确不同区域建设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重点与任务。黄河上游干流长度占黄河总长的31%,多年平均出境水量占黄河径流量的49.40%,是全流域最主要的淡水涵养地和最重要的生物栖息地,生态地位非常重要。因此要将水生生态安全置于第一优先级,担负起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和补给、生态修复、水土保持与污染防治重任,重点打造绿色生态廊道。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黄河文化的“根”和“魂”所在,因此中游省份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以文化创意和文化旅游为中心,集中展示黄河流域数千年以来的文化遗址、文化风貌、文化变迁、文化传承、文化创新等集约形态,打造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核心区段。黄河下游区位优势优越,交通便利,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和产业发展动能,因此要充分发挥黄河下游地区社会经济优势,打造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增长极。二是建立自上而下的分工引导机制。

从国际经验来看,分工机制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日本、芬兰、荷兰等国家在国家战略规划中都有明确的空间布局导向。欧盟也建立了智慧分工平台,将结构基金的预算分配作为前提约束引导各地区主动参与区域分工合作。建议制定《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发展规划》,明确优先保护的对象和空间布局的总体方向,利用土地政策、财政金融、人才等导向型政策,引导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向,促进黄河流域九省(区)合理分工。

(四)探索廊道共建共享机制

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重要目标就是构建要素跨区域统筹利用的机制,用以矫正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循环累积效应”和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防止资源要素的过度集聚。因此要优化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建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牌共建共享机制。一是加快黄河上游等欠发达区域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绿道、游道建设、游客接待中心、解说系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共建,在统一的规划引导下进行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阐释、教育、旅游建设等工作。鼓励区域毗邻的省份通过共建观光公路,共建景区、度假区等形式,提升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连接性和通畅性。二是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推进廊道信息共享,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建立黄河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服务公共平台,促进区域间信息、技术、知识的流动与连接。^⑩实施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数字再现工程,建构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孪生系统。三是搭建区域合作平台,通过组建产业联盟、组织高峰论坛、节庆会展等形式,搭建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合作平台,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旅游客源市场合作、项目洽谈、投融资等形式展开广泛交流。四是创新区域联合营销推广机制,整合九省(区)资源,构建主题突出、形象统一的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形象标识系统,形成体系化的廊道品牌矩阵。整合政府、企业、个人等各方资源,以黄河文化资源整合、IP开发、产业延伸、品牌传播、资产管理等为抓手,在内容把关、解说系统、推广策略、营销创新、品牌体系、品牌营销等方面做好系统规划,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内引外联的黄河文化传播格局。

注释:

- ①王志芳,孙鹏.遗产廊道——一种较新的遗产保护方法[J].中国园林,2001(05):86-89.
- ②俞孔坚,奚雪松.发生学视角下的大运河遗产廊道构成[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08):975-986.
- ③陶犁.“文化廊道”及旅游开发:一种新的线性遗产区域旅游开发思路[J].思想战线,2012,38(02):99-103.
- ④侯仁之:黄河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3-5.
- ⑤朱强,俞孔坚,李迪华,彭文洁.大运河工业遗产廊道的保护层次[J].城市环境设计,2007(05):16-20.
- ⑥李飞.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结构演化研究——兼述旅游于其中的影响[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9,35(05):133-140.
- ⑦汪芳,苗长虹.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思维与策略[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01):270-272.
- ⑧数据来源:国家文物局《黄河文物保护利用规划》。
- ⑨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及《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0》整理。
- ⑩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及《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0》整理。
- ⑪程金城.中国非遗与中国文化基因勘测——以“黄河—长江文明走廊”非遗为中心[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4):2-11.
- ⑫杨越,李瑶,陈玲.讲好“黄河故事”:黄河文化保护的创新思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12):8-16.
- ⑬李飞.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结构演化研究——兼述旅游于其中的影响[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9,35(05):133-140.
- ⑭张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报告(2020)[M]//段庆林,打赢新时代黄河生态保卫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4.
- ⑮李飞.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结构演化研究——兼述旅游于其中的影响[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9,35(05):133-140.
- ⑯吴锋,宋诗睿.破圈与共生:黄河干流边界共生型文化资源协同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J].北京文化创意,2022(01):4-12.
- ⑰黄雅静.黄河生态廊道构建研究及应用[J].黄河.黄土.黄种人,2022(05):28-29.
- ⑱方创琳.黄河流域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空间组织格局与高质量发展[J].经济地理,2020,40(06):1-8.
- ⑲张玉蓉,樊信友.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生态与文化遗产廊道的构建探析[J].人民论坛,2020(33):75-77.